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15

■ 政治管理

近十年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要论^①

王慧慧^{1,2}

(1.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2. 湖南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在多学科领域展开,尤其是近十年发展迅速,促进了幸福感研究层面与多元学科渗透,积累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影响因素、测评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展望,旨在为我国居民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居民; 幸福感; 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080-06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Domestic Residents' Happiness in Recent Decade

WANG Hui - hui^{1,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researches on domestic resident's happines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many fields, which has especially enriched the research aspects of happines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disciplines in the past decade, and thus accumulated some new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s of domestic residents' happiness in recent decade and makes prospect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found study of China's residents' happines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esidents; happiness; research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主体精神的回归,对幸福的探讨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追求幸福不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是每一个社会的最终价值目标^[1]。在发展中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满足之间取得平衡,尽可能地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成为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新课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与重视。近代居民幸福感研究发源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我国的研究要晚于西方,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研究理论的引入以及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应用方面,近十年的研究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飞跃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推进了研究层面与多元学科渗透,幸福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医学、哲学等综合发展的交叉学科,呈现出一种融合、吸收、互济发展的学术景观。从经验借鉴、理论推演到指标体系构建、测评模型及实证分析,构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体系雏形,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① 收稿日期:2014-07-10

作者简介:王慧慧(1979-),女,山东济宁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理论研究。

一 居民幸福感研究的新理论视角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主题的发展,居民幸福感研究的关注点也在动态演进,从个体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逐渐拓展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等宏观背景视角。

(一) 社会发展观与 GDP 反思的视角

从幸福的本质来看,人的幸福必然要求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互依赖互为条件^{[2]44}。但传统 GDP 作为衡量经济总量的最重要指标,忽略了环境资源的价值耗损,忽视了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生态投入。随着全球化的环境恶化和资源危机的加剧,从 GDP 的反思中重新定位幸福与社会发展理念的研究开始增多。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杰认为,以 GDP 为代表的传统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单一化、简单化、片面化,只重视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从“GDP 崇拜”到强调综合指数是从独尊效率转向兼顾公平^[3]。西安交通大学蔺丰奇认为,GDP 价值坐标存在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与成本等方面的缺陷,以国民幸福总值为核心的核算体系,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向标^[4]。广州大学马丽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幸福和 GDP 的相关指数越来越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应单纯追求 GDP 的增长,而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的提高^[5]。

(二) 党的执政理念与价值取向的视角

执政理念可以充分体现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必须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这是执政宗旨和目标是否明确的前提条件,也是执政党争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首要标准,因为人民总是首先以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作为判断其优劣的主要依据。”^[6]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在当前的社会转型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更多挑战,人民幸福与执政理念关系的研究成为顺应当前我国国情的研究新视角。

西安交通大学张慧芳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他们的利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把社会核心价值从经济发展提升到增进民生福祉的高级层面^[7]。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刘闻佳认为,幸福指数与我党新时期执政理念是内在统一的,关注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凸显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8]。

(三) 政府责任与政府善治的视角

人是幸福的主体,幸福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但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的需求和欲望却通常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而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其幸福^[9]。“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状态”^[10]。政府责任与政府善治,都是从政府可作为的角度分析政府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薛金华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多元文化发展需求等都需要政府保障与供给的角度,探讨了民众幸福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11]。湖南科技大学罗建文从民生幸福的角度,论述了民生幸福与政府善治的内在关联性,民生幸福是检验政府善治能力的试金石,是善治政府的价值目标,而发展民生幸福也有利于促进政府的善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张增船认为,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的贯通性,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12]。

二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繁杂多样,心理学背景下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经济学背景下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社会学领域有个体差异因素也有宏观环境因素等,这些因素相互交错又相互作用。综合现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对其较为主要的因素从四个大的方面进行分类:

(一) 人口学变量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自威尔逊(Wanner Wilson,1976)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提出幸福的人口学特征以来^[13],人口

学变量因素的横向研究开始盛行。人口学变量一般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家庭规模、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研究者较多假设幸福感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存在相关性,研究结论与这一假设也基本一致。

例如,毕明等通过对山东17市抽样调查发现,城市居民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其中55岁以上群体指标值最高,18-34岁群体次之,而35-54岁群体最低^[14];吴启富也得出类似结论,不同年龄的人群其幸福程度、幸福观有着明显的区别,青少年和老年人群感到最幸福^[15];吴丽民等认为婚姻因素与性别因素交互影响幸福感的产生^[16];张明军等的研究表明,居民幸福感与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稳定、家庭关系等因素显著相关^[17]。国内研究者在人口学变量上取得了大致相似的结论,但在探求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上整体滞后于国外的研究。

(二)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考察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源远流长,是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中的热点。从经济至上把“物质”“财富”等同于幸福,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等理论的提出,目前大致回归到一种理性研究层面。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我国是否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如果存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引入其他变量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幸福感等问题展开的,这些研究中的具体因素可以具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宏观经济因素,如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失业等。有研究者认为,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18]^[84];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幸福水平;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19]。第二种是相对收入、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如王鹏研究认为,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20];任海燕利用相关系数法以及有序概率回归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尼系数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21]。第三种是个人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从横截面上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但收入不是幸福的唯一影响因素^[22];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联^[23],在同一地区、时间上,收入水平较高人群的幸福程度相对较高,收入不是显著影响因素,但一定的收入是幸福的必要要素^[24]。

(三)社会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60]幸福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一个国家越发展、越民主,人民就会越幸福^[26]。幸福依赖于人与周围环境,社会成员只有从爱和服从的原则出发才能有普遍的幸福(Auguste Comte, 1971)。因此,幸福的标准在各个时代、民族、阶级是不同的^[27]^[3]。

社会因素具有广义的内涵,主要包括空气质量、卫生、绿化等居住环境因素;住房条件、社会治安、医疗、教育条件、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民生因素;公共政策、民主权力、政府绩效等政治因素;人际交往、社会参与等社会关系因素。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研究者基于的出发点是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幸福感受周围客观环境的影响。健康的居住环境、人文关怀的民生政策、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增加幸福感,相反会降低幸福感。研究多与“和谐社会”“民生保障”“贫富差距”“环境保护”等词语相关联。

例如郑方辉等通过对广东居民幸福指数实证研究探讨了政策公平性、政府廉洁、执法公正等政治因素对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影响^[28];丘海雄等认为,居民幸福状况的改善与提升一般是诉诸于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可以经由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共开支加以实现,如资源的公正配置、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的达致,教育、健康与安全的保障等^[29];陈刚等发现政府质量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其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远远高于经济增长^[30]。毛小平等基于CGSS数据,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31]。

(四) 主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因素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心理学的主观幸福感领域。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主观因素是人格因素^[32],即使它不是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的预测指标之一^[33],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导致不同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及生活满意感^[34]。人格可以反映一个人总体心理面貌,是相对稳定、具有独特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因此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

一部分研究解释了人格的直接影响,如李艳玲等得出主观幸福感和人格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有显著负相关,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相关^[35]。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人格因素通过其他因素间接产生作用。如邱林等以大学生为被测群体,得出外倾和神经质是SWB的重要预测指标,情感平衡是外倾和神经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36];也有研究者将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结合研究,如李中权等认为除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外,神经质和外倾性还会通过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间接影响幸福感^[37]。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从自尊(徐维东,2005;严标宾,2006;耿晓伟,2008;叶晓云,2009;等)、社会支持(邢占军,2007;尤瑾,2007;吴捷,2008;孔风,2012;等)、自我效能、归因方式(余鹏,2005;于福洋,2009;孟慧,2010;等)等其他主观因素进行了研究。

三 居民幸福感的测评研究

(一) 测评取向与方法

居民幸福感测评方法与幸福感研究取向一脉相承,幸福感研究开创伊始就遵循着两种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健康研究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研究。与传统心理学相比,积极心理学要求心理学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38],注重心理健康的评价与测量。对幸福感的测量主要采用主流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法和自陈量表(self-report inventories)法。例如,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总体满意感量表(SWLS)、夏普量表(SHARP)、情感平衡量表(ABS)等。国内学者在对国外量表试用、修正的基础上开发了一些新的量表。如邢占军编制了包含充裕感、公平感、安定感、自主感、宁静感、和融感、舒适感、愉悦感、充实感和现代感在内的适用于大规模调查研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并通过测量学特性检验,证实量表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效标效度和构想效度^[39]。

在生活质量研究取向上,研究重点既包含影响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也包含生活的主观感受。伴随着后来的“社会指标运动”,逐渐形成了指标体系测量法。通过指标体系构建,并对各项指标赋值、计算得出居民幸福感的值,即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法常用于社会学、经济学领域,也是新近居民幸福感测评探讨中使用较多的方法。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主观感受和满意度相对应的主观指标体系,如李杏从物质层面的满足感和精神层面的愉悦感两方面建立了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身心状况愉悦度、幸福感比较和个体与社会和谐程度的五大指标^[40];二是以客观对应条件的客观指标体系,如程国栋提出的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等六类构成要素的国家层面的指标体系^[41];三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如俞灵燕等建立的包含收入分配等16项客观指标和身心健康等47项主观指标的指标体系^[42]。

(二) 测评层面与实践

学术层面:学术层面的测评主要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体现的,包括指标体系构建,如构建原则、权重分配、体系结构等(李杏,2008;郑方辉,2009;俞灵燕,2010;马立平,2007;张荣山,2011;罗建文,2012;等);测评工具与实证探讨,如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相子国,2005;宫春子,2006;周四军,2008;陈佃慧,2011;刘国风,2012;等);基于具体变量的测量,如政策效应、政府绩效满意度、公众参与等(康君,2009;刘修通,2012;邹安全,2012;李文彬,2013;等);测量结果的比较、运用(严标宾,2003;李楨业,2008;林洪,2010;等)。但由于各自遵循的研究传统和逻辑思路不同,部分测评结果存在差异性。

政府官方层面:从2005年两会中国科学院士、政协委员程国栋提交的《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开始,我国幸福感测评逐渐进入官方视野;2006年国家统计局宣布启动国民幸福指数的研制工作,并作为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重点科研项目实施。2011年两会上“幸福”成为关注焦点,一些地方政府把“幸福”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早于国家层面开始了测评实践方面的尝试。江苏省江阴市制订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五个好”设定5大类共42个客观评价指标,围绕“五个满意度”的50个主观指标^[43],在测评原则上坚持“问计于民”,将幸福感测评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44]。广东省政府于2011年发布了《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等10项一级指标^[45]。国家宏观层面的幸福感测评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充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地方的实践迈出了幸福测量从理论到应用的第一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作为一种新的视角与工具,如何在测评过程中更好定位居民幸福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如何为幸福测评提供制度保障等也成为亟待厘清和解决的问题。

社会机构层面:幸福感研究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离不开社会团体组织的参与和媒体的助推。如《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合作,对我国六大城市幸福情况进行调查、排名,2009年再次发起并主办“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调查与推选。《南方企业家》《小康》、央视财经频道、零点调查公司、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城市研究竞争力协会等其他多家媒体与机构也都曾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了不同规模居民幸福感调查、排名。社会机构与媒体对幸福的测评往往通过大规模样本调查取得,样本、调研方法的差异性导致出现一些不一致的调查结果,在学术的参考性与民众的认可性上引发了一些争议。

四 结 语

目前居民幸福感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理论困境与测评技术上有待解决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传统、思路、方法、工具不同导致的差异性结果上。例如在指标体系的编制中,心理学倾向于微观层面的个体的幸福感,主要从个体欲望、动机、兴趣、认知、情感等因素的内部生成机制来进行研究,而社会学侧重于从一定社会背景下共同的幸福认知与体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影响机制来构建指标体系。因此,研究方法 with 测评工具的深化整合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

同时,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任何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体现。幸福感研究是从应用中发展起来的实践科学,研究的归宿也应该回到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上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政府的有利推动。尤其是在关注人民幸福逐渐成为一种执政理念的宏观行政环境下,如何实现政府与学术研究的对接,如何真实了解居民的幸福状况,如何设计科学的测评机制与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如何从制度层面建立幸福感测评的保障体系来更好地发挥幸福感研究、测评的运用效果,将是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下一步着重探索的新课题^[46]。

参考文献:

- [1] 罗建文,赵嫦娥,李惠阳.论公共政策设计中民生幸福的价值本质[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32-36.
- [2] 陈惠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 [3] 沈杰.从“GDP崇拜”到幸福指数关怀——发展理论视野中发展观的几次深刻转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3):65-70.
- [4] 蔺丰奇.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J].中国国情国力,2006(7):29-31.
- [5] 马丽.要GDP还是要GNH?——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评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44-47.
- [6] 黄立营.论执政理念的战略地位与时代内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11):14-19.
- [7] 张慧芳,文启湘.民生幸福与社会和谐[N].光明日报,2007-06-05.
- [8] 刘闰佳.从幸福指数看我党新时期的执政理念[J].哈尔滨市党委党校学报,2011(5):69-71.

- [9] 俞可平. 善治与幸福[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2): 1-3.
- [10] 罗建文, 邓明君. 从GDP崇拜到GNH关怀的伦理分析[J]. 伦理学研究, 2007(2): 52-58.
- [11] 薛金华. 民众幸福与政府责任[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12(5): 40-43.
- [12] 张增船. 民生幸福意域下的政府善治[J]. 理论界, 2011(11): 20-23.
- [13] Wilson W R.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 67(4)294-306.
- [14] 毕明, 孙承毅.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年龄差异研究[J]. 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2): 126-127.
- [15] 吴启富, 马立平. 北京市城镇居民年龄性别幸福感差异分析[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8(5): 75-78.
- [16] 吴丽民, 陈惠雄, 黄琳. 婚姻、性别与幸福[J]. 浙江学刊, 2007(1): 220-225.
- [17] 张明军, 孙美平, 姚晓军. 兰州市居民幸福感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10): 36-43.
- [18] 曹大宇.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 [19] 田国强, 杨立岩.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 经济研究, 2006(11): 4-15.
- [20] 王鹏.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3): 93-112.
- [21] 任海燕, 傅红春. 有序概率模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研究[J]. 求索, 2012(3): 1-4.
- [22] 朱建芳, 杨晓兰. 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09(4): 7-12.
- [23]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09(11): 79-91.
- [24] 马立平. 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2(3): 123-125.
- [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6] 庄忠正. 马克思幸福观的三重意蕴[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5-8.
- [27] 赫伯特·斯宾塞. 社会静力学[M]. 张雄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8] 郑方辉, 冯淇, 卢扬帆. 基于幸福感与满意度的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2(2): 16-20.
- [29] 丘海雄, 李敢. 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析研[J]. 社会学研究, 2012(2): 224-246.
- [30] 陈刚, 李树. 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 ——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8): 55-67.
- [31] 毛小平, 罗建文.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42-45.
- [32] 段建华. 主观幸福感研究概述[J]. 心理学动态, 1996(1): 46-51.
- [33]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 95(3): 542-575.
- [34] DeNeve KM, Cooper H. The happy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of 137.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4(2): 197-229.
- [35] 李艳玲, 李建伟. 人格特征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2): 226-227.
- [36] 邱林, 郑雪.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及其与人格特质的关系[J]. 应用心理学, 2005(4): 330-353.
- [37] 李中权, 王力, 张厚粲, 等. 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 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学, 2010(1): 165-167.
- [38] 李金珍, 王文忠, 施建农. 积极心理学: 一种新的研究方向[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3): 321-327.
- [39] 邢占军.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编制[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3(6): 103-105.
- [40] 李杏. 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建构[J]. 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 2008(11): 144-145.
- [41] 程国栋, 徐中民, 徐进祥. 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J]. 地理学报, 2005(6): 5-15.
- [42] 俞灵燕, 王岚. “幸福指数”编制及指标体系建构探析[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0(10): 23-25.
- [43] 朱民阳. 以人民幸福评估发展——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思考[J]. 行政管理改革, 2011(3): 75-78.
- [44] 于洪生. 幸福观引领下的地方治理——对“幸福江阴”建设的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9): 118-119.
- [45]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情况说明[EB/OL]. (2013-01-20)[2014-01-14]. http://www.gddpc.gov.cn/xxgk/rdzt/xfgdzbtz/ztgf/201301/t20130120_196429.htm.
- [46] 周玮. 从儒家“乐”思想到幸福感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3(7): 34-37.